

辩证法的追求与闪光

李辛生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辩证法的追求与闪光

李辛生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辩证法的追求与闪光/李辛生著. -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1.1

(学者论丛)

ISBN 7-80105-910-7

I. 辩… II. 李… III. 辩证法-研究 IV. B0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0398

学者论丛

辩证法的追求与闪光

- 作 者 李辛生
责任编辑 李正堂
封面设计 灵人
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肇庆市端州报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开
13.5 印张 32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05-910-7/C·24
总 定 价 198.00 元(共 8 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地址

北京安定门内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64010831 64010840

目 录

序 言	(1)
-----------	-------

第一章 中国辩证法在岭南的闪光	(3)
-----------------------	-------

一、近代辩证法的文化土壤	(3)
--------------------	-------

二、儒道墨互融的先秦子学辩证法	(22)
-----------------------	--------

三、老子在先秦哲学中的地位及其对岭南文化的影响	(36)
-------------------------------	--------

四、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辩证法	(50)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的辩证法洗礼	(90)
----------------------	--------

一、劫后余生的辩证法呼吁	(90)
--------------------	--------

二、恢复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地位	(102)
----------------------	---------

三、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客观普遍性和方法论功能	(120)
-----------------------------	---------

四、螺旋式发展的依据、渊源和实质	(131)
------------------------	---------

五、“螺旋运动与扬弃”研究思路	(147)
-----------------------	---------

附录：日本学者对中国否定之否定规律论争的反映	(157)
------------------------------	---------

第三章 唯物辩证法体系的科学建构	(170)
------------------------	---------

一、唯物辩证法体系建构的认识分歧和论争	(170)
---------------------------	---------

二、否定与矛盾在辩证法中的关系和地位	(179)
--------------------------	---------

三、唯物辩证法核心思想的形成和理论来源	(192)
四、唯物辩证法规律的相互关系和逻辑结构	(222)
五、吸取系统论成果,丰富辩证法理论	(230)
六、唯物辩证法体系的几个理论问题	(238)
第四章 改革与发展的辩证法	(247)
一、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的突破	(247)
二、第一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轴心	(262)
三、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体系和架构	(277)
四、实现伟大历史转变的强大动力	(286)
第五章 开放与扬弃的辩证法	(293)
一、开放与扬弃	(293)
二、开放与社会主义	(310)
三、作为自我扬弃的社会主义否定的性质和特征	(341)
四、社会主义社会肯定和否定因素的形成及其功能、 作用	(347)
五、社会主义农业发展中的两次否定	(353)
第六章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辩证法	(365)
一、社会主义辩证法的对象和逻辑起点	(365)
二、人权与人道主义和民主的内在逻辑关系	(371)
三、农业集约化、现代化的开拓	(384)
四、发展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对立统一	(400)
五、生态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和发展趋势	(411)
后 记	(422)

序 言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自古迄临 21 世纪的今天，从社会矛盾之复杂，历史变化之巨大，学术思想之活跃来看，最突出的历史时代有四个：一是春秋战国，二是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三是“五四”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四是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阶段。四个时期之间，有些历史跳跃，间隔久远，骤然看来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中国文化潜蕴深邃，哲学思想传承不绝，相互之间不能不存在脉络贯连的内在关系。从思想发展史看，四者联系的主线在天人、道器及其演变规律上，如关于天人关系衍化及其“变易”、“革新”、矛盾的衍生和转化等辩证法思想。作者早期阅读过杜国庠先生《便桥集》和《中国思想通史》，对先秦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萌发一个念头，以儒道墨思想为契机，探索一下先秦以来这几个时期为主的我国辩证法思想的发展，如从杜老先秦子学研究开端，到近代岭南海疆文化的形成，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变革思想之崛起，直到毛泽东的矛盾辩证法的创立。可十年动乱一来，这些想法顿成泡影。尤其在形而上学猖獗的低气压下，不仅对斯大林简单化、片面化曲解辩证法的负效应未清除，反而把辩证法的一些基本规律都践踏了，以至在辩证法教材和理论宣传中根本没有逻辑性系统性可言。然而，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七十年代末终于迎来了理论上正本清源的春风，给学术界增添了不少理论勇气，也使作者敢于为辩证法理论的科学性呼吁，提出恢复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地位。从此，才把中断了的辩证法研究的线头，重新接上辩证法规律的论

争上来,使作者坚持了辩证法理论的追求。同时由于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和现代的改革开放多是策源于南粤,或以南粤为前沿,延伸至全国,导致作者以南粤看全国,或从全国看南粤的视角,探讨辩证法在南粤的光辉实践和体现,并形成如下的思路:以近代岭南文化的形成、发展为土壤,儒道墨互融的先秦子学在岭南的传衍开始,到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社会变革思想的光辉实践,概括地反映出中国辩证法在南方的初露曙光作为第一部分;继之在邓小平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的辩证法思想推动下,从岭南学者提出否定之否定规律地位的恢复到辩证法体系的建构,作为辩证法追求中不同观点学术论争的理论火花构成第二部分;然后进一步从各个不同侧面描述 20 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辩证法实践,集中展现以南粤为前沿延伸到全国的邓小平辩证法理论光辉作为第三部分。作者循此线索结合各个时期的写作成品和半成品,作一次系统加工提炼,便形成现在“辩证法的追求与闪光”书稿。然而我国的改革开放在不断深化,现代化建设正加速步伐,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实践中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还在发展,因而在论述上的不足和错误在所难免,但作为近现代辩证法在我国南方的孕育、成长的一个摸索,也算是一次尝试吧。

作者 2000 年 6 月

第一章 中国社会辩证法 在岭南的闪光

一、近代辩证法的文化土壤

岭南文化是华夏文化的一支奇葩,它从中原文化南移与西学东渐的碰撞之花,进而逐步酿成为近代辩证法的文化土壤。而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中,如何看待它的属性、特征及其与现代辩证法认识论的关系,发挥它的时代功能和作用,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一)以中原文化为根,越汉文化为体的海疆文化的 孕育

岭南地处古越,它的先民均是炎黄始祖的一脉,历史渊源可远溯到旧石器时期的原始群时代,但作为“岭南”概念的出现却在春秋战国之后。因而中原与岭南的联系,即始于秦末。史籍“岭外”、“岭表”等提法,乃起于中原人的称谓。汉后至唐代才慢慢称“岭南”。盛唐时已设岭南镇及节度使。

公元前3世纪初,秦灭六国,统一华夏,中原文化逐渐南移,

岭南始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这就是随着秦皇朝政治、经济的扩展,中原文化突破黄河流域,向四周伸延,推进了岭南文化的形成、发展。经过有秦一代至汉初的开发和整治,以楚、蜀、吴为中介,中原的文物制度迅速流传和辐射至五岭,在岭南生根、衍发,演进成了汉越融合的岭南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

中原人从干寒的北方进入南粤,初期虽不胜炎暑,但四季常绿、一年两熟、且多海产的海疆毕竟又具有吸引力,因而从秦汉至唐宋,历代南徙的中原人,零散者不计,较大规模的至少有四、五批。每批多至数十万,如裴骃的《史记集解》引证的史料,秦皇三十三年,一次遣戍“五十万人守五岭”。^① 说一次 50 万,难免有夸大,但也可见其人数之众。南徙的中原人人粤安家创业,与越民杂处,代代繁衍,带来了中原的汉文化和风俗习惯。在制度文明融合的同时,从秦将赵佗当政开始,入主南粤的中原统治者,均较尊重越族风尚、服式,注意吸取汉族文化,使汉越人民消除隔阂,长期和睦相处,促进中原人“与越杂处”的世代嬗传中,相互通化,“其流风遗韵,衣冠气习,熏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庶几中州”。^② 从而在岭南逐渐形成以儒家忠孝、节贞为内核的封建伦理道德,奠定了以中原文化为主源,越汉交融为体系的文化根基。

同时,更重要的是南迁的中原人,一方面既带来了汉楚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传入了铁器牛耕、铸钢冶铁、窑烧砖瓦、轮制陶瓷等手工业技术,使中原物质文明得以在岭南推广和应用,开始改变了“火耕水耨”的粗放耕作,发展了水稻栽培和排灌操作的农业技术。另一方面,又因秦汉士卒建造军事设施,还带来了铸冶技术,促进了手工业生产。1988 年广州象岗南越文王墓

① 《史记》第一卷,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253 页。

② 道光《广东通志》卷九十二。

出土有“蕃”字的铜鼎。别的汉墓也发现了很多文饰相同的南粤式铜器。这说明 2000 年前,岭南铸冶业达到了如此高的水平,完全是中原和蜀楚技术传衍的结果。“五岭以南人才出矣,财货通矣,中原之声教日近矣,遐陋之风俗日变矣。”^① 有力地促进了汉越融合的岭南文化的形成、发展。

同时,汉唐设教,演化出既崇儒又兼容道、佛的宽松文化。赵佗立国,用秦汉政制和礼法治理岭南,把以儒为宗的汉文化与“椎结箕踞”的岭南习俗结合起来,灌输了中原的封建等级礼仪,摆脱了落后、粗野陋俗,又保留了合理的生活风尚,使南越国统治“甚有文理”。通过两汉学校教育和礼义熏化,先进的中原社会文明和儒家文化在岭南得到系统地传入,逐渐培育起岭南的社会文明和土生土长的文人学士。

唐朝张九龄入朝参政和韩愈在粤兴学,也进一步推动了岭南儒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张九龄一方面继承了以仁、德为本的儒家治国之道,又吸取“立法制之”和“尚变”、“务实”的法家思想。在文学以清淡自然的笔调,一扫六朝浮靡的陋习,开创了盛唐一代的诗风。韩愈曾三度驻粤,重振乡学,尊崇孔孟,传播儒学,兴办学校,用儒家建功立业思想教导学生,对发展以儒学为主的岭南文化起了重大作用。岭南文化虽以儒学为正宗,但并没有受此禁锢,相继在秦至西晋年间,陆续接受了道教和佛教的影响,东晋葛洪上山炼丹,著有《抱朴子·内外篇》、《金匱药方》和《肘后备急方》。在这些著述活动中,把两汉时期元气本原论思想纳入道教,同时精探了炼丹术,总结汞、金、银、铅等元素变化规律,成为具有素朴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岭南道学始祖,为道家神仙论奠定了自然哲学基础。

道教南传不久,东汉至六朝时佛教相继传入岭南,古称粤桂

^① 明·郑善:《广文献公开大庾岭路碑阴记》。

间的交趾及其后的广州成为中外佛教出入的中心。东汉时避乱至交趾的牟子,是我国较早的佛教阐释者,曾在岭南“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为酒浆,玩《五经》为琴策”。^①至唐高祖时,原籍范阳,入籍新州(今广东新兴县)人惠能,经曲江宝林寺至湖北黄梅等地多年寻佛拜师,受禅宗五祖弘忍传授《金刚经》和法衣后,即南归粤北隐迹,至唐高宗仪凤年间于广州光孝寺受戒,正式成为禅宗六祖。他改革了过去佛教的渐修渐悟的方法,主张顿悟,因而创立了禅宗顿教,扩建了宝林寺,至宋改称南华寺,作为传播顿教的演法场。他主张一切皆空,人的真心本性即是佛的思想,从净思顿悟的教旨,抛弃了六朝以来烦琐不堪的天竺佛法,建立了带有玄学色彩、适合中国哲学传统气质的佛教教派,把岭南佛学思想的发展推向高峰。这不仅对宋代陆、王心学产生了影响,对后来佛教的流传和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都发生了深远的作用。

(二)岭南文化向近代过渡的动因、特点

在秦汉奠立的汉越融合文化的基础上,唐宋以后随着明清经济的发展,国际的交往,进一步推动岭南文化向前演进。

1. 宋明至清代,商品经济发展,是岭南文化向近代过渡的根本动因

盛唐以后,连年战乱,中原经济屡遭破坏,全国经济政治重心开始南移。北宋统一了五胡十国,在岭南采取多种稳定的政治措施,缓和社会矛盾,使社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战乱中相继南流入粤的土民,渴望安居乐业,纷纷参与了广南水乡和珠江三角洲的垦辟。其中许多是江、浙、闽各路商人和手工业者,对岭南商业和工业的开拓发挥了有力的作用。北宋与南宋时代,

^① 牟子:《理惑论》。

岭南社会比北方稳定,各地重视农田水利的兴修。粤东的韩江和粤西的雷州都进行整治和引水工程,双季水稻技术有了改进,耕作面积不断扩展,稻谷产量大大提高。宋真宗时,广东粮食已经有了储备和输出,加之经济作物的繁茂,农业的商品性生产也显著增加了。与此同时,内地人口南迁和土地垦辟的增多,土地买卖的不断加剧,土地的私有和兼并也日趋严重。但另一方面,广大佃农的人身依附关系却相对减弱,因而又有利于佃农生产积极性的提高。明朝朱元璋开始实行府、州、县建制,重视农业和水利的建设,广东的农田水利得到全面发展,据统计,广东全境 10 府兴建水利共 1166 宗,耕地面积明显拓展。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不断改进,因此明朝中叶以后,农业商品性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商品种类大增。还有,手工业生产也很快发展,曲江的冶铁,佛山的陶瓷、缫丝,番禺、东莞的榨糖,新会的制葵,高州、阳江的造船、沿海的制盐、采珠等都蓬勃兴起。

随着农、商和手工业的发展,广东的对外贸易日益活跃。至清朝,广州已成为与欧美、东洋、南洋贸易的中心。英、德、美来广州的商船,逐年增加。从 1714 年至 1720 年康熙年间,平均每年有 10 多艘,1785 至 1795 年乾隆年间每年 50 多艘,1796 年至 1820 年后嘉庆年间每年 70 多艘,1821 年至 1830 年前后的道光年间急增至每年 110 多艘。

在这样的手工业、农业、商业、外贸发展的基础上,鸦片战争前后的广东民族资本主义已经萌芽、产生。据广东史学界考证 1872 年南海的陈启源利用华侨投资创办缫丝厂,是广东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有女工 600—700 人,出丝精美,远销欧美,是全国最早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1880 年,黄秉常创办的广州电灯公司,比宁波电灯厂早 10 年。1879 年创办的佛山巧明火柴厂是我国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火柴企业,日产 1000 多盒。1882 年南海钟星溪创办的造纸厂,日产纸 62 担,比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

造纸厂早 8—9 年。1903 年办的潮汕铁路股份公司,是建造我国第一条民族资本的铁路企业。接着洋务运动到广东,官办企业也相继产生。广州机器局是地方官办的军火和造船业。另外,张之洞于 1886 年还筹办了广东钱局,铸造铜钱和银币,1888 年,还筹办了广东机器织布纺纱官局。

可见,广东在宋明以后,经过康熙、乾隆时代,商品经济已有很大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已经产生,并早于中国的官僚资本,是全国民族资本主义最早萌发的地区。从而使岭南文化思想在商品经济萌芽的土壤上,形成它重视民生和经济效益,并易于接受近现代西方文化的特性。

2. 重商经济和民族资本的兴起,促进岭南文化务实、富民思想的形成发展

伴随封建制度逐步衰落,商品经济渐受重视,民族资本主义缓慢萌发的条件下,一批具有务实、重利、富民和倡新思想的学士贤杰,已成为岭南经济、文化学术的代表,反映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前的社会意识形态。

明朝中叶的邱濬(1420—1495 年),广东琼山人,官至礼部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主持朝廷大政进行政治、经济问题决策。《明史》认为他“一生无书不读”,尤“以经济自负”。在成化、弘治年间满朝大臣中,他是一个济世安民,研究政治经济问题的杰出思想家。他史著甚丰,对当时和后来影响较大的是《大学衍义补》一书。它以 160 卷的恢宏篇幅,论述了治理国家税赋财政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认为“财用为立国之本,食货为生民之本,而得民则为君之本”。这是“一个国家强弱兴衰,财政状况的好坏与此关系很大”^①的根本问题,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关于生产与财政、财政与流通的思想。他认为,“人资财以生”,不能

^① 《岭南文化思想史》第 178、337 页。

离开物质财富,因而国君要讲求生财之道,为民理财,“藏富于民”。政府征用力役,不要“妨害”生产活动,赋税不要多取于民。当时他已看到商贾和市场的重要性,以及货币流通的作用,开始感到农业生产的发展,有赖于商品和货物的流通。因而认为市场上的买卖,可以使人们“各遂其所欲”,而货物流通靠的是商贾。因此政府不要与商争利,不要采取抑商政策,不要搞海禁,要允许商人造船出海贸易,使“南货日集于北”,“北货亦日流而南”^①,扩大社会的商品流通。同时,他还深入考究了货币的起源,认为社会“欲通其有无,必资钱以易物”,这是货币出现的原因,因而反对废钱用谷帛的倒退做法,进而主张实行以白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钱为下币的三币制。并提出货币价值必须与交换物的价值相等,而商品价值的多少,又取决于商品的“大小精粗”和人的功力的“浅深”。这些思想正是来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从而哺育出经世致用、重商、务本、富民的学术思想。

与此前后,还有清初,番禺史学家、诗人屈大均和后来的南海朱次琦、番禺陈澧等,都是关注人民现实生活和国家命运、经世致用的思想家,屈大均著的《广东新语》28卷,对岭南的“天文地理、山川草木、鸟兽虫鱼、物产矿藏、制作器用、经济生活、科学官绩、学术师承、文史著述、书画艺术、文物古迹、社会风习乃至对外贸易等,都无所不载。其中尤着重于经济生活和社会现实论述,随在揭发矛盾,指陈时弊”^②。他们的治学议政,都开始批判了脱离现实崇尚清淡的学风。陈澧认为经学者“惟求有益于身,有益于世,有功于古人。有裨于后人”^③。可见,当时进步的

① 参见蒋祖璋、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4、364页。

② 同上。

③ 《与黎襄伯书》(《东塾集》)卷四。

思想家都逐步认识到民生经济的极端重要性,注意到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重视经济的社会效益和实用。这也就是后来岭南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前身。

3. 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碰撞,触发岭南人民探新学、倡变革、行新制的文化思潮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和中外贸易的发展,西方殖民主义对我国早已虎视眈眈,千方百计要打开中国的城门,他们首先依靠的是传教士的活动。可是伴随宗教的渗入,西方科学文化也开始传入我国,从而掀开了中西文化相互冲击和渗透的历史。最早来广东的传教士是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1779年经澳门到广州,四年后便引进另一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他们先后在肇庆和广州学习中国语言、书法、风俗习惯,穿唐服,行汉礼,广与当地人士交游,传播西方的科学文化,包括天文、地理、数学、机械方面的知识,教人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经过五六年在广东的传教活动,便站住了岭南这一据点。鸦片战争前后,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经济、军事的入侵,文化渗透影响的加强,“西学”的进一步东渐,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到广州,用中文译《圣经》,开始接受华人梁发等人教。梁发根据中国人情风俗,阐发基督教义,写了《劝世良言》。洪秀全受此书的影响,接受了基督教关于反对奴役统治和偶像崇拜的思想。接着香港、澳门和广州相继创办了各种中外报刊,宣传西方文化和中国的维新变法思想,唤起了岭南一批批思想家,学习西方,倡导变革的思想。

首先,中西文化交流,触发了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探讨新学的要求。1880年前后,中山人郑观应关注时政,热心西学,著《盛世危言》,批判抵制西学的顽固思想,主张既要学轮船大炮、汽机工艺等西学之用,又要学“议政于议院,

君民之体”，认为中学与西学“合则本末兼赅”^①。1839年来广东禁烟的林则徐，为了掌握实情，组织编写了《四洲志》，接着魏源又编了《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些都是为了学习西方科技，以补我国文化之不足，振兴中国，对付西方列强。洪秀全正是用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的结合，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理论家洪仁玕，也是受瑞士传教士的影响学习天文历数，主张吸取资本主义文化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商业。中国第一个留学生，香山人容闳，把赴美留学所得写成《西学东渐记》，并向洪仁玕，提出政治建议，主张借用西方文明改良中方文明，使“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

其次，适应时代竞争，积极倡导变革。这是封建制度日趋崩溃，新的制度在酝酿的社会呼声。对竞争和变革进行理论鼓吹的，继郑观应之后就是康有为。他不满于在封建专制和孔孟礼教驯服下，长期来朝廷上下都安于现状，缺乏竞争观念的时势，他说：“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故于外无事雄竞长之心，但于下有防乱称患之意。”^② 因而有志之士都慢慢认识到在“列强并立，争雄、角智”的时代，如不改变这种甘于落后的保守思想，民族的生存都难以维继了。康有为在考察日本维新后，进一步提出“万国竞立世，最讲进取，比权力量，彼涨此必缩，无可中立，故改革者所谋自强，必自强可进取”^③。指出当政者不要把力量放到去对付人民革命，而应该放到国家制度的改革上。孙中山根据竞争与科学冒险的关系，说明了要革命，必然要有“习练”、“试验”、“探索”和“冒险精神”，这是人类“文明的动机”，也是探求真理的科学方法。

① 郑观应：《道器》。

② 《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戊戌变法》（二）第177、258页。

③ 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卷六。

还有,废科举、办新学,改革教育制度。当时先进的人们觉悟到,要实行变革、更新体制,首要条件是需要一批具有革新思想的人才。因而岭南革新者,极端重视人才培养的教育制度,提出废除科举,学习西方,开设新学的主张。江门、南海和广州等地的学者,纷纷创办学堂,自由讲学。新学的改革,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教学方法和学风的改革。他们改变了过去脱离实际的读经、注经的“八股”学风,如早就名震京师的江门陈白沙学派办的新学,就开始提倡学术自由思索,主张经世致用的学风。二是教学内容的改革。凡是新开学堂,都陆续增设一些自然科学和近代西方文化知识、体育、卫生的内容。当时的南海西樵云谷书院、大科学院,广州的“学海堂”和越秀、广雅、粤华等书院,以及康有为的“万木草堂”都是推行西学,改革教育制度的新学,对促进中西文化的结合,推动维新变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4. 封建统治衰败,殖民主义入侵,激发了岭南救国图强的爱国性和民主性结合的文化特色

封建社会进入晚清,统治集团的昏庸、腐败,殖民主义步步进逼,直至鸦片战争爆发,激起了广东人民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从三元里抗英开始至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岭南人民谱写了一曲曲壮烈的爱国主义诗篇,涌现了一批批伟大的救国图强的英雄人物。

岭南人民身处祖国南疆,在近代国际交往中,历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欺侮,被触发起对殖民主义的仇恨,培育着民族和个人的主体感、自尊感和自强不息精神;同时又痛感清王朝的腐败和无能,萌发着救国图强、民主变革的思想,形成了近代广东人民爱国主义的新特点:一方面将爱国与“忠君”、“精忠”与“愚忠”区分开来,使爱国主义与民族自身的主体感、荣辱感、自尊心结合起来,产生了炎黄子孙国格、人格观念,这是近代岭南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岳飞是宋代流芳百世的爱国